

### “我们胜利了！”

在胜利的时刻，李友邦当然比谁都更想重返家乡，可他还有公务在身，于是委派义勇总队副总队长张士德为代表。李友邦还特地要他带一面国旗回台湾。

雨，忙完一天公务的李友邦照例回家吃饭。一家人刚刚在二楼走廊的饭桌前坐定，楼下突然传来一阵阵叫喊声：“投降了！投降了！”随后一位本地报纸的记者跑上楼来，赤着双脚，高举双手，脸上湿淋淋的，不知是雨水还是泪水。他扯着嗓子欢呼道：“日本投降了，我们胜利了！”

李友邦一家连饭也顾不得吃了，一起跑上了街头。龙岩县城不大，主要街道就那么几条，一时间被闻讯而来欢庆的人群塞满。所有人，无论互相认识不认识，无论男女老少，每一张脸上，都是泪水混合着雨水，互相拥抱，如同亲人。特别是对李友邦他们这样被迫背井离乡，为生存和尊严而苦苦抗争的台湾人来说，这一阵及时的雨水，洗刷着多年来大家内心最沉重的压抑，也洗净了长期流离失所的悲伤。

大概过了半个月，九月二日夜十二点多，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寇英上将遣访台湾义勇总队队部，事先没接到通知的李友邦非常惊讶，赶紧起来接待。这才知道，第二天太平洋舰队有飞机要去台湾，接受侵台日军投降。这位美国将军问李友邦，要不要派人同行。

在胜利的时刻，李友邦当然比谁都更想重返家乡，可他还有公务在身，于是委派义勇总队副总队长张士德为代表。李友邦还特地要他带一面国旗回台湾。

九月三日，搭载中美受降代表的太平洋舰队飞机降落在台北松山机场。九月四日上午，张士德由太平洋舰队军官陪同，在台北宾馆升起了五十年来飘扬在台湾土地上的第一面中国国旗。

从十几岁时怀着满腔热血袭击台北的日警派出所而被迫流亡，到年近不惑时以国民政府中将身份重回故土，李友邦朝思暮想的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、光复台湾”的心愿，终于变成现实。此时此刻，他意识到自己肩上的责任更加重大了。他要带着台湾义勇总队的六七百名战士回到故乡，为战后重返祖国怀抱然而百废待举的台湾，筹划一个美好的未来。

他们又利用队员通晓日语的优势，担任情报工作，突击鼓浪屿上的日本海军军火库。还曾配合国民党一个师的部队，对厦门进行武装突击，强有力地震慑打击敌人。

抗战胜利前夕，美军提出了一个轰炸日本军事基地的大规模计划，台湾义勇队奉命参与其中，发挥谙熟日语的优势，负责刺探日方情报，供盟军参考。

随着台湾义勇队在一次次实际作战行动中民间声望不断壮大，不仅身在大陆的台湾人纷纷前来投奔，也吸引厦门、泉州一带的抗日民众纷纷加入，加上潜伏敌后的地下工作者，最多时达七百余人。

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黄昏，闽西龙岩县县城，天下着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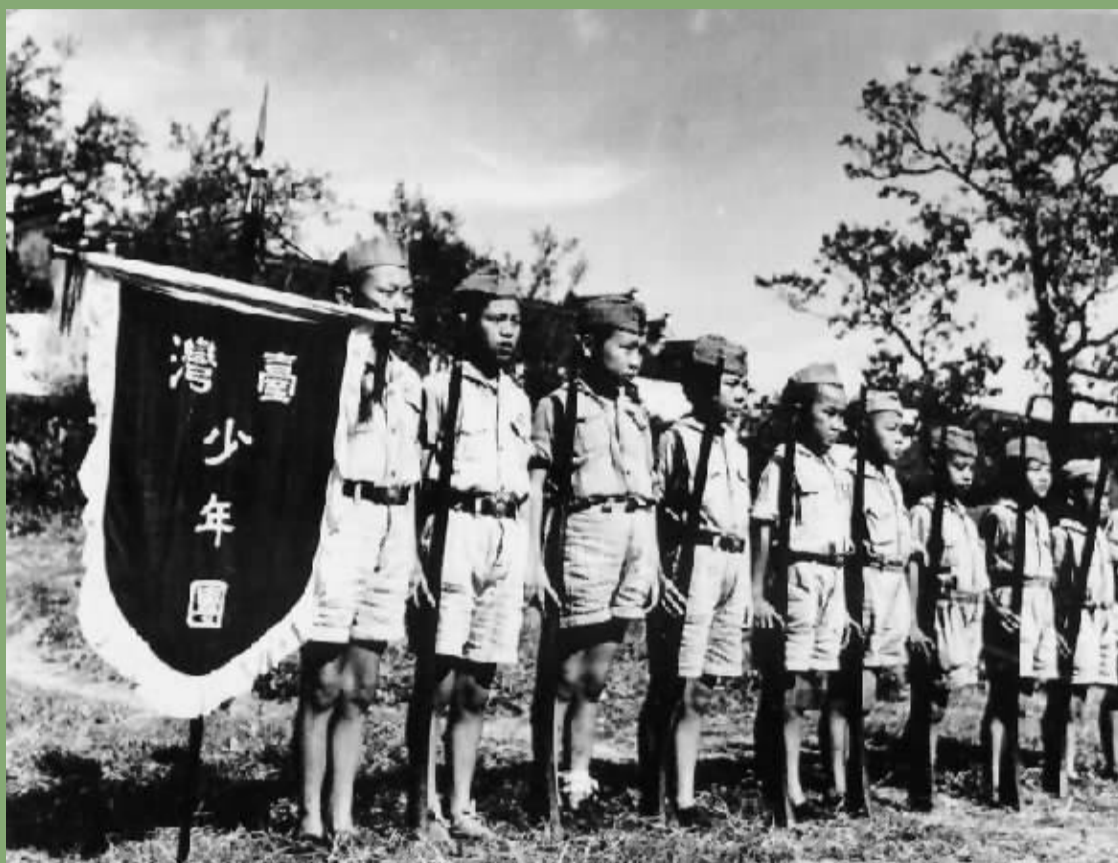
### 衣“褐”还乡

国民党政府赴台高官里应外合、集体腐败的现象，不仅让李友邦等人寒心，也越来越让台湾普通民众深恶痛绝。

抗战胜利与台湾光复，意味着被迫与祖国大陆分隔半个世纪的台湾，必然要面对一轮重大的权力转换和社会重组。

一九四五年台湾光复之前，李友邦就任“三民主义青年团”（简称“三青团”）台湾区团部主任。原来早在一九四二年夏天，台湾义勇队移驻浙闽赣交界的闽北南平县时，接到国民党上级指示，必须在队中成立“三青团”，李友邦奉命照办。没想到，“三青团”台湾区团部日后成了台湾光复之初安定岛内局势最重要的一块招牌。

光复接收后，李友邦领导下的这个“团部”，几乎囊括抗日精英及左、右各派的所有重要台籍领导人和骨干。当日本殖民统治失效、国民政府接收机构和干部



“台湾少年团”成员多为十岁左右的孩子，是“台湾义勇队”中一支持殊的力量，因表现出色，当时官方报纸撰文称赞他们是“抗日宣传的有力劲旅”。

### 上篇回顾：

二十世纪二十年代，台湾热血青年李友邦为反抗日本殖民统治，冒险潜返大陆，入读广州黄埔军校，投身大革命。但因思想上接近左派，卷入“分共清党”风暴，无端遭受牢狱之灾。直至全面抗战爆发，才迎来人生转机，积极组织“台湾义勇队”，重新投入抗日斗争。

### 先锋话题 >

## 一个台湾人的抗日之路 (下)

文 / 杨渡

上回说到，全面抗战爆发后，国共迎来第二次合作，出狱后一度在杭州以教授日文勉强谋生的李友邦，决心发动身在大陆的台籍抗日志士，筹组“台湾义勇队”。

### 创业艰难义勇队

筹组“台湾义勇队”的努力并非一帆风顺，李友邦只能不断动用黄埔军校的旧关系，到处请人帮忙，希望国民政府同意立案，提供财政上的补助。

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，当年参加过“台湾义勇队”下属组织“台湾少年团”的王正南与高仲明，回忆起五十多年前李友邦在“台民垦殖所”广场上召集他们发表演讲那一夜的情景，仍难免心潮起伏。

李友邦对濒临绝境的台湾同乡们说：“你们再住在这里，即使不饿死也会病死，活不下去啊！与其这样死了，不如起来一齐抗日吧！要死也要战斗而死，不能默默死在这里！”

有人问他：“要怎么抗日呢？”李友邦回答说：“大人可以扛起枪上前线，用日语对日本人做宣传，让他们反战。”

“那小孩子怎么办？”有个当父亲的情绪激动地问道。

“小孩子一起来，我们一齐宣传

### 只要抗日 来者不拒

尽管李友邦明知有些台籍人士是打着“革命”旗号，图谋个人私利名位，但大敌当前，只能求同存异。

由于李友邦以往与国民党左派渊源太深，国民政府对他牵头发起的“台湾义勇队”，并不是全心全意支持的，义勇队虽宣告成立，但申请公文迟迟未获官方批复。

义勇队经费无着落，一开始全靠李友邦自掏腰包，自行设法。最穷困时，每日两餐，早餐稀饭，下午干饭，没有什么像样的菜，只好几个人就着一块豆腐乳下饭。少年团的孩子们正在发育期，特别容易饿，却总是吃不饱。有一次队部转移到乡下，孩子们在一个水塘里抓到些泥鳅、小鱼，都兴奋得跳起来。几十年后，这些“老小孩”回忆起此事，无不视为当年最快乐的时刻。他们异口同声地说：“因为我们小孩子也可以生产、可以做贡献了，最重要的是可以加菜，吃上荤菜了！”

从一九三八年秋天到一九三九年，李友邦几度往返于桂林与战时首都重庆，多方托关系，特别是找有

李友邦此举，得到国民党桂系领袖之一、浙江省政府主席戴绍支持，又获他的狱中难友、中共浙江省委统战工作委员会委员骆耕模具体协助。义勇队的第一项任务，是救援战时因“日特嫌疑身份”被迫迁徙到闽北山区小县崇安垦

荒，处境极为艰难的数百名台胞。刚刚抵达崇安“台民垦殖所”，李友邦便一家一户去看，发现台胞们大多只能在当地孔庙及旁边临时搭建的寮子里安身，根本无法称之为“家”。一些人患了疟疾，躺在床上，盖着厚重的棉被，全身还在发

抖；原本住在福州、厦门这样的大城市，生活优裕的医生，不得不上山“垦荒”，干砍柴、搬石头的粗活，营养不良，自身难保；有些人想私自逃走，却被看管的军人抓回来，用扁担打得流血不起；而极度绝望试图偷自杀了结者，不在少数。

因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数十年，那时候的台湾人，理论上都是日本“国籍”，而大陆上从官方到民众，对“汉奸走狗”深恶痛绝，台湾人的尴尬身份确实非常不利——无论你怎么积极抗日，都免不了被别人怀疑为日本特务。

李友邦所做的一切因此也有着双重意义：就大局而言，台胞共同参与抗日，可以扭转台湾屈辱的殖民地命运；从切身利益出发，也唯有借此才能洗清“台湾歹狗”的恶劣形象。

李友邦的妻子严秀峰回忆，光复之初刘启光返台“接收”，因两手空空，还求过李友邦帮忙呢。人心如此叵测，真是让人不胜唏嘘。

到了当父亲的年纪，却依然单身。他安慰孩子们说：“你们不要难过，你们都是我的孩子，我会照顾你们。”李友邦身边的友人都知道，那时候每次有人为他介绍女朋友时，他总是拒绝：“我许过愿，台湾没有光复我就不会结婚。”

孩子们并不知道，他们眼中这位抗日英雄和亲切体贴的叔叔，自身处境其实也非常艰难。

筹组“台湾义勇队”的努力并非一帆风顺，李友邦只能不断动用黄埔军校的旧关系，到处请人帮忙，希望国民政府同意立案，提供财政上的补助。就连奔赴崇安去拯救受难台胞，动员他们加入义勇队一事，也是通过黄绍竑写介绍信，找到时任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，才得以办成。陈仪乐得卖这个顺水人

地位 and 实权的黄埔同学帮忙，加上台湾义勇队的实际抗日行动逐渐获得各界肯定（详见本期 E2 版相关文章《“台湾义勇队”抗战往事》），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终于通过立案，很快批复申请并拨下经费，供义勇队使用。

尽管困难重重，李友邦仍依靠招募到的台湾同胞，根据各人的能力和特长，设法开展工作。应募加入义勇队的台胞，大多为医生、文化工作者和教师，精通医术与日语，成了“台湾义勇队”的标志。

借着开设战时医院，队员们闲时又开荒种地种菜等方法，义勇队总算生存了下来。一切大小开销由队部掌握，队员们基本上没有薪饷，每人只按月领取零用金。

为了尽可能增强抗日力量，李友邦认为在大陆的台籍人士应联合起来，捐弃彼此过去的派别成见，成立共同团体。一九四〇年，他与报人出身的台湾彰化人谢南光

（编按：谢氏时任国民党调查统计局设计委员及《大陆报》编辑等职，1949年后留居大陆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人大代表、第三届人大常委会委员）共同组织“台湾革命团体联合会”。

尽管李友邦明知有些台籍人士是打着“革命”旗号，图谋个人私利名位，但大敌当前，只能求同存异。他的宗旨是：只要是真心诚意，有助于抗日，不管任何党派，一律欢迎！因此共产党、国民党和无党派台胞，他都来者不拒。

“台湾义勇队”规模得以扩充，台湾嘉义人刘启光（编按：1940年起，刘氏先后出任国民党中央直属台湾党部筹备处秘书、台湾工作部主任等职）从重庆派两名干部到义勇队总部驻地浙江金华，谢南光也从上海动员二十多名干部前来加盟。

岂料曾是台湾抗日同志的刘启光，竟试图收买两名义勇队员，

准备暗杀李友邦，以便取代他的地位。幸而那两人良心发现，最终一五一十向李友邦透露实情，并交出了刘为他们准备的行刺武器——钢笔手枪。

刘启光本名侯朝宗，是台湾岛上活跃的农运团体“台湾农民组合”的重要干部，后赴大陆参加抗战，并投靠国民党特务机构军统。抗战胜利台湾光复后返台，当了新竹县长，在县长任内接手日据时期留下的金融机构华南银行，加以改组，自任董事长，很快成为一方财阀，可谓飞黄腾达。而许多曾经并肩作战的老同志，经历国民党迁台后的白色恐怖时代，不是被枪杀就是长期蹲大狱，故他们中有些人一直无法原谅刘的所作所为。

据李友邦的妻子严秀峰回忆，光复之初刘启光返台“接收”，因两手空空，还求过李友邦帮忙呢。人心如此叵测，真是让人不胜唏嘘。